

“减税降费”是医药改革突破口

日前,针对内地八成外企原创药贵于港台的现象,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解释称,“香港没有5%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没有15%的医院加价,流转费用也不会达到20%,加上这些药价自然会高”。

可见,内地进口药价高企与税收、流转成本关系密切。应当指出的是,药物关乎民众身心健康,是一种被动消费的特殊商品,其所承担的税负及中间环节加价理应得到行政性约束,而不是任由市场力量无限放大。特别是作为公

共政策一部分的税收制度,更应体现出对药物领域的倾斜支持态度。在当前国内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背景下,减免附加在药物上的税费可以让广大病患直接获益,其目标绩效与税收制度的初衷如出一辙,应当成为未来相关制度改革着力点之一。

美国有研究表明,在处方药价格增加10%后,患者对该药品的使用率下降了2%~6%;在贫困人群的家庭中,由于税收增加而使药品使用率减少的现象更为明显,而在减少处方药25%的税收之后,则可以

增加5%~25%的需求量。显然,吃药不同于吃饭消遣可以丰俭随心,药物消费具有一定刚性,但中低收入群体对药价波动表现更为敏感,其价格体系理应向低标准看齐,并体现出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爱。事实上,在高收入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已实行了对药品免征税收的政策,而美国一些州政府也通过处方药免税之举向中低收入家庭施以援手。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内地近年来也延续了对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免征增值税的政策,让这些“保命药”能以较低价格抚慰病患的

心灵。

然而,药物的减税降费改革仍有较大空间需要拓展。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治疗乳腺癌的药品赫赛汀,香港售价折合人民币14800元,而内地价是25000元,彼此相差1万元之多,一年下来香港与内地病患的支出差距将高达12万元。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药物享受到了免税待遇,再加上销售链精简,终端药价得到了极大压缩。相形之下,内地也应在药物关税等方面作出改进,但尚需突破一些现实阻力才得以成形。例如,内地化学制剂多以仿制为

主,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孱弱,关税门槛儿降低国内药企可能因此而受到重创。

此外,在商业贿赂打击不到位的语境下,如若药品进口商将关税降低所节约的成本继续用于“人脉疏通”,那么广大病患同样难以享受到药价降低的福利。因此,在以减税降药价、惠民生的征途上,主管部门还应当同时兼顾引导技术创新与公平竞争氛围等工作,以此有效削平外企原创药在内地与港台间的巨大价差,还利于民。

(经济学博士财经评论员 马红漫)

@ 一语惊人 @

“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解放孩子,救救汉语”
——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

出处:《现代快报》

“拉稀距离我这个途经的普通游客不到2米,人那个多啊!我那个震惊”
——赵薇曝中国游客在罗马当街大便。

出处:新华网

“只要能放了我,我晚上就留下来陪你过夜,随便怎样都行”
——福建女子酒驾被查,称可陪民警过夜。

出处:中国江苏网

“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数千人感染艾滋病”
——广西男子在网上谎称数千人染艾滋被拘,实为200人感染。

出处:新华网

“家里有灯的地方都被人放了炸弹”
——南京独居老人半夜报警谎称家里有炸弹,称报警只想找个人说话。

出处:《扬子晚报》

“我的犯罪动机是想获得免费吃牢饭的机会”
——重庆男子火烧三辆汽车,向警方自首时如是说。

出处:《新民晚报》

“让你们瞧不起人,我要让你们都付出代价”
——哈尔滨少年因欠1元车钱遭司机辱骂,连砸7辆出租车泄愤。

出处:《生活报》
(木梓 辑)

买“好评”



这两天,湖南省邵阳市很多市民都接到一条短信,短信开头是:“邵阳人要说邵阳好,家乡才能真的好。”短信是邵阳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发来的,短信称,请接到省里民意调查电话,同时给出了客观公正、积极评价的市民,凭通话记录可以领取误工费补贴300元。针对此事,邵阳当地已发出叫停的紧急通知,并要求立即纠正、坚决杜绝类似的相关做法,不得出台任何干扰民意的措施。

当地政府究竟在怕什么?说好话补贴300元,这是出钱“买”表扬,而且钱花得是相当大方,竟然只要超过5分钟,凭电话记录单就可以拿钱,即便是误工费补贴,这个“补贴”也太高了。一般情况下,如果自身做得过硬,就不怕老百姓说“坏话”。只有自己平时工作做得不好,或是心

中有亏的情况下,才会出此下策。

“说好话补贴300元”,如果打的电话过多,按一个电话300元计算,这显然是一笔不少的开支。但这些钱由谁出?邵阳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为何有那笔钱?是否在预算内?毫无疑问,这笔钱完全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完全是在乱花钱。

最该拷问的是民意调查形式,为何只是打电话?为何事先告之?民意调查如果想要真实,就该深入老百姓当中,而且应该悄悄地进行调查。而不是事先“广而告之”,让被调查者事先“作弊”。如果不事先“打招呼”,又何来“说好话补贴300元”的“丑剧”?因此,这就要拷问形式主义的民意调查。民意调查如果只是走走过场,那谁都无法保障民意调查“不走样”?文/王军荣 图/王乃玲

大商·新玛特两周年店庆之 功能篇

本报记者 王 婷 通讯员 易有玲

“商无定式”的创新之道

短短的两年时间,信阳新玛特已经发展成为信阳商业的龙头企业,信阳市民购物的首选场所,这段商业传奇的背后,秉承了怎样的业态和营销模式,继续一路高歌的新玛特在信阳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2011年9月,信阳新玛特强势入驻信阳,以一站式休闲购物的全业态经营为主要特色,集百货、超市、电器、餐饮、娱乐为一体,组建功能更

全、购买力更强的大型综合购物广场,3万多个品类的大型超市,3000多平方米的大商电器卖场,电影院、美容美发、风味小吃、健身、娱乐无所不有,具有超强的聚客能力。从此,追求时尚潮流的人们不必长途跋涉,不出信阳就能买到高档、称心如意的商品。

“鲶鱼效应”提升信阳商业。信阳新玛特的迅速发展,给广大的供应商提

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它在全市范围内营造出一店开张、激活一方的“大商效应”,加速市场竞争的同时,给信阳的商业市场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随着大商集团对外拓展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城市像信阳一样感受到了大商集团的进驻所带来的一个又一个变化,包括原有商业地产升值、城市功能完善、城市形象提升、税收增加、促进人员就业等。

反对“奢靡节庆”回归节日之本

“双节”即将接踵而至,送礼似乎热度不减。新京报对118位北京居民走访发现,超过7成受访者会送礼,有的礼金超过5000元。节日送礼让很多人不堪重负,但似乎又难以摆脱。

前几天,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天津调研,谈到节日送礼的奢靡之风问题,强调要“刹住公款送月饼节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调研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举的一个例子,让人颇有感触。他说去年在北京开会,正赶上中秋节的前一天,是送礼高峰,他当时从东城到西城,堵在路上一个半小时。他坐在车里面就想到了一句话:“我们节日的内涵被偷换了。”

节日送礼,送到交通大拥堵,也算是一件奇闻。推而广之,婚嫁嫁娶、升学毕业、节日庆典,名目之多,礼物之重,送礼让人不堪重负,早已是普通百姓的感同身受。

送礼潮汹涌袭来,无疑是对节日和人文内涵的侵蚀。民俗学家邓迪斯曾说,日常生活中,时间线性流逝,而节日是这直线上的刻度,有了度量,时间才有意义。节日承载的意义,原本在于情感联络、价值共享,是文化认同的符号。可“攀比式送礼”,成了节日“重头戏”,却在冲淡节日的本义。

送礼俨然逾越了礼节范畴,成了例行事务,而非风俗沿袭。它重分量、讲排场,比阔气,已演变成奢靡歪风的踪影。跟风式地送大礼,看似能体现诚意,却未必能折现为“情感分量的增重”。当民众情感表达陷入“送礼依赖”,这也是对感情的物化。它非但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还会助长攀比、挥霍风气,与勤俭美德背道而驰。

节日被异化的背后,其实是人和人关系的异化,更是一些官员手中权力的异化。不少公职人员假节日之机公款送礼,润滑关系、打通人脉,为寻租铺路,它本质上是种腐败。陕西“表哥”杨达才受审,就说其500多万元的来源不明财产,是“过年过节下属或者同学送礼”,节日送礼暗藏的腐败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歪风盛行之下,必会毒化社会风气。正如王岐山所言,“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民风和党风政风彼此影响、推波助澜,但党风政风显然更具“示范”作用。

官员送礼,所费甚至有公款,所图也未必都是正当利益。前不久,媒体曝光,在正风肃纪的背景下,有些“天价月饼”摇身一变成“百宝盒”,以迎合公款送礼的需求。如果党员、官员都热衷礼尚往来,只会带动民风不正,加剧社会上的人情风、攀比风。

王岐山说,“党员干部要带头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全社会共同努力,做民风转变的参与者、实践者”。其中的关键,还是拿出务实行动,给公款戴上紧箍咒,遏止“公款送礼”等腐败,给净化民风提供标杆。

(据《新京报》)